

【史学史研究】

李大钊、郭沫若 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

谢辉元

【摘要】在以往的史学史叙事中,围绕李大钊与郭沫若的学术定位,曾经呈现出一定的张力,这是伴随着李大钊史学贡献的“再发现”而来的。对他们的评价,受到理论渊源、学术范式、学术传统、政治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同时也牵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点认知和分期问题。应当辩证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的历程与节点。在诸种分期标准和分期方式中,史学形态为比较合适的分期标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为比较合适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标志,李大钊和郭沫若则分别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芽期和形成期的标志性人物。

【关键词】李大钊;郭沫若;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形态

【作者简介】谢辉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南京),2022.4.200~211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及重大问题研究”(项目号:19JJD77000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地域性聚集现象研究”(项目号:21CZS003)的阶段性成果。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过程中,存在两个节点性人物,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过程中的两大坐标,即李大钊和郭沫若。见诸一般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著述中,两位学者都曾被赋予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者的学术地位,但相关认识之间仍然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异。如香港学者许冠三就曾表示李大钊因为唯物史观理解的问题,长期以来不被官方视为正宗,只是被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而非中国唯物史观派的开山。^①王学典也以为五四到“抗战”历史观念的变动,使得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观念的源头与李大钊时代没有太多的连续性,而这是唯物史观派史坛长期以来宁愿把自己的学统上续到郭沫若而不肯上续到李大钊的基本原因。^②许、王二人敏锐把握住了学界在李大钊和郭沫若评价上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它是否确如许、王二人所说是历史观的差异造成

的问题,仍然值得考究,其中还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起点认知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回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叙事,对上述问题进行确认,并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史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叙事中的李大钊与郭沫若

在民国时期的史学史叙事中,人们对于李大钊、郭沫若的史学贡献已有不少讨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大钊的史学研究所起的引路作用,曾为时人所瞩目。1920年,季融五在讨论井田制问题时就对李大钊所开展的“惟物的研究”作过肯定。^③30年代,李大钊的《史学要论》(1924年)颇受史学界的关注。卢绍稷在《史学概要》(1930年)中将该书作为现代重要史学著作作介绍。^④1933年,刘静白也极力称赞该书“很有理论的意义”,是“新的科学底史学萌芽”,认为“这种立于理论研究底意味上的这种精神底试探,把历史学高调起来,确是值得我们注意”。^⑤

虽然《史学要论》在当时也因与日本学者内田银藏的《历史理论》有诸多相近之处,而为朱谦之等人所诟病,但两书的差异性实际要大于相似性,^⑥而朱氏也终究承认李大钊是中国史学界“马克思派”的代表。^⑦此外,在刘剑横、周容、李则纲、杨鸿烈等人的史学著述中,李大钊的观点也一再被引用。^⑧李大钊围绕中国历史做的一些具体研究,在五四时期有一些回响,此后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他在理论方面的贡献,尤其是《史学要论》备受推崇。

对于李大钊史学工作的总体评估,人们更多放在思想史中进行。如邓中夏1923年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称呼李氏为中国思想界倡导科学研究的“唯物史观派”的“巨子”。^⑨鲁迅1933年在为《守常文集》作序时,称李大钊的遗文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⑩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1935年)中对李大钊的评价更高,认为:“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⑪由此看来,李大钊传播唯物史观以及倡导将它运用于史学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贡献,最为二三十年代的学者所看重。

李大钊虽然是20年代史坛“马克思派”的代表,但其史学研究还未臻至成熟便因李氏的牺牲而中断,此后为以郭沫若史学研究为代表的社会史大论战绽放的光芒所掩。在30年代的学者眼中,郭沫若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最耀眼的那颗明星。稽文甫在《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1年)中强调:“对于中国社会之科学的研究,是三年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主潮。其在历史方面,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要算是震动一世的名著,就大体看,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敬仰。”^⑫何干之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1937年)中也指出,郭沫若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目前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它的研究为出发点”。^⑬郭湛波亦予以高

度评价:“郭先生是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研究甲骨文字最有成绩的人。不只开中国史学界的新纪元,在中国近三十年思想史上也有莫大的贡献。”^⑭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1938年)中也表示:“在中国开始以史的唯物论把历史来作系统研究的,要算是郭沫若”,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虽然有许多错误,“但由于他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从物质基础上去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乃至意识形态,所以他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是有着其相当供(贡)献的一个人。”^⑮郭沫若的史学研究在30年代受到唯物史观论者的高度认可,其社会史研究成就尤其受到肯定。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郭沫若的史学贡献仍然备受瞩目。马克思主义者对其评价甚高,视其为新史学的旗手和引路人,这从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国史学会首任会长即可看出,自不待言。即使是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郭沫若的工作也大加肯定,他们看重的是郭沫若将唯物史观与古史材料结合、开拓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贡献。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释古派”,认为“释古派的初期代表人物是胡汉民”,而“使释古派发展而与疑古派、考古派鼎足而三地成为中国转变期的新史学的是郭沫若”,并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下称《古代社会》)关于史学以“批判”为目的的主张,是“释古派之坦白的宣言”。^⑯与此相近,靖公在《新史学批判》(1944年)一文中,认为新史学有三个代表人物,即梁启超、胡适和郭沫若,而郭沫若“使释古派发展而与疑古派、考古派熔冶而成为中国转变期的新史学”,“像他那样广泛地应用甲骨和金文来研究古代社会的,确乎是第一人。故其中不免有若干错误,然而他在这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能湮灭的”。^⑰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中也指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郭沫若《古代社会》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

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我们认为:郭先生的贡献偏在破坏伪古史上,而陶先生的贡献却在揭发整个中国社会史的真实,虽然他的研究还是草创的,但已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⑩齐思和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9年)中认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在北伐后就逐渐展开,但“到了郭沫若先生才真正的走上了学术的路上”。《古代社会》《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都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有许多重要的贡献”。^⑪1951年,董作宾在台湾撰文,认为郭沫若将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⑫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以后,史学界对李大钊的关注度降低,论者寥寥,故40年代有研究者呼吁对其思想予以重视。张好礼在《中国新史学的学派与方法》(1945年)中,就前述周予同有关“唯物论派”的评断提出不同意见:“周予同先生讲述此派时,曾说此派初期的代表人物是胡汉民。这话诚然不错,然而他竟然完全忘掉了李大钊,实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漏。”李氏留下的著作并不算多,“似仅有《史学要论》一书与十余篇论文”,“然而他在唯物史观派内所应占的地位,恐亦不在胡汉民先生之下”,“惜乎,关于他的学说与方法论,尚未见有专文论述,仅有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曾讲到他”。^⑬另外,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9年)指出:“中国最初介绍唯物史观的学者是李大钊先生”,“尝作《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之价值》等文,介绍唯物史观的精义。”^⑭非马克思主义者对李大钊史学贡献的认同,更多地体现在对《史学要论》等专门性的史学理论著述上。

不过在马克思主义者方面,抗战时期对李大钊史学虽关注不多,但并未遗忘,他们关注的重点是,李大钊拿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史的一些具体问题时的贡献。这主要是因为能够更好地接续此后郭沫若等开创的史学道路,契合革命需要。如金灿然在《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1941年)中简单提到李大钊曾初步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伦理关系。^⑮解放

战争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史总结的增多,李大钊史学逐渐引起更多重视。1947年,杨荣国在纪念李大钊的文章里,肯定他在五四时代从经济基础去分析孔家店理论的工作,认为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后称《近代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最先一篇用唯物史观来看中国历史的文章”。^⑯1949年,范文澜、王南在《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李大钊同志》一文中,称李大钊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家”,肯定其史学可以影响人生、变革社会的提法,并将《近代思想》视作“中国早期企图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处理中国历史问题的尝试”。^⑰同年,吴玉章在评述李大钊倡导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时,亦称该文为“开始运用历史唯物论来作发现中国历史规律的尝试”。^⑱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李大钊史学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既有成果也重在总结李大钊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及以之观察中国历史的成就。如刘绍孟的《李大钊同志和历史科学》(1959年)、杨丙元的《李大钊同志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1965年)两文,结合《史学要论》《近代思想》等多种材料,较全面地讨论了李大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探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工作,称李氏为“中国早期的历史科学家”和“我国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⑲

对李大钊史学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全新的局面。随着国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热潮的涌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兴起,引发了人们对李大钊学术地位的再审视。皮明麻明确指出,李大钊“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是人所熟知的,但“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还没有充分地被认识”,而这项研究工作将“有助于弄清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源流”。^⑳从当时以及后来的研究成果看,人们一般将李大钊的史学贡献总结为三个方面:系统传播唯物史观及其基本原理;探索建立史学理论体系;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历史。与此前相比,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叙事新增了对李大钊之史学理论贡献的全面考察与认同,《史学要论》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成为李大钊最

富特色的史学贡献。这无疑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热潮下重新建构的结果,也与三四十年代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李大钊史学成就的评价暗合,而人们对李大钊史学成就的认识也变得更加全面。

对于郭沫若的史学成就,经过长期的研究积累,人们已经获得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即主要涉及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甲骨文研究、古代思想史研究、整理古籍等五个领域,此外还有历史人物、农民战争、历史剧等方面的贡献。^②郭沫若史学成就范围广、影响大,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郭沫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者的学术定评,非但没有被撼动,反而愈加巩固。

在上述情况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叙事围绕李大钊与郭沫若的学术定位,出现了一定的张力。人们对李大钊的评价是:“在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征路中,李大钊同志确有破土动工,铺垫下第一块基石的功绩”;^③“亲自倡导历史学革命的先驱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④“对史学体系的全面阐发,最先为中国无产阶级史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⑤“我国历史科学的奠基人”;^⑥等等。人们对郭沫若的评价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创者”;^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祖之一”;^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开创者”;^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者”,^⑩等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更多地赋予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先驱者”“奠基者”的身份,郭沫若则是“开创者”“开山者”。90年代以后,这种区分仍然存在。如蒋大椿评价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早奠基者”;“郭沫若是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位大师”,其《古代社会》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作”。^⑪朱政惠也认为“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位开山大师”。^⑫

为什么有“奠基”与“开山”的区别?蒋大椿说得最清楚:“一幢大楼从奠基到建成有一个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奠基到形成也有一个过程。李大钊等先驱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性贡献,主要

表现为对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介绍和阐发,以及使之初步运用于历史实际的个别问题和个别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则意味着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和阐发。这项工程1928年便开始了。1930年1月,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标志。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郭沫若无疑有首创之功。”^⑬这种认识集中反映了许多学者在区分李大钊和郭沫若史学功绩时的依据。“奠基”与“开山”本属描述不同事物创生时期的词汇,但在他们看来,却明显有着先后之分,“开山”便意味着“开创”“形成”,也即一座史学大厦的成形。所以在上述著述中,李大钊著述的“不成熟”“局限”“缺点”,经常被提到。

不过,上述区分也并不绝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很多学者并不在意这种词汇上的差别,用“开山”“开创”描述李大钊。如李华兴有李大钊“开始应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和解释历史,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祖”的判断;^⑭侯且岸有李大钊有关著述是“我国现代史学理论的开山之作”的认识;^⑮张艳国也言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⑯吴汉全言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开创者”;^⑰欧阳哲生言李大钊是“近代中国历史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在历史理论建构方面具有开山的地位”。^⑱亦有用“奠基”描述郭沫若的。如桂遵义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古史研究的奠基之作”;^⑲林甘泉既称该书为“最早尝试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⑳也称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㉑陈其泰言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作品”;^㉒葛懋春认为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㉓等等。而除了“奠基”“开山”外,诸如“开端”“兴起”“建立”“开创”“诞生”“开拓”“拓荒”等名词,都曾用于描述李大钊和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要之,人们对于李大钊和郭沫若

之所谓“奠基”和“开山”的区分,逐渐变得模糊。而这种区分在七八十年代的出现,可能是时人为了更好地接续此前的史学史叙事传统而作出的选择。

回到前面许冠三的指称,学界对李大钊、郭沫若的评价,确实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奠基”与“开山”的区别,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更为明显,但在此前或此后,这种区分远不像许冠三所描述的那样截然两分。其中潜藏的区分理由,即学术贡献和典范意义的不同,与许冠三描述的——根源是对唯物史观理解的不同——并不一样。实则这两者都应该是造成李大钊与郭沫若学术定位差异的根源。只不过,前述许冠三对大陆学界的指摘,只提及唯物史观理解差异这一单一因素,似乎具有某些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所谓“内地官方”长期不把李大钊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宗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可能在潜意识中存在,但在此后随着李大钊史学理论贡献的“再发现”,这种意识已经淡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史的不同分期

学界对于李大钊、郭沫若的评价,也牵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史问题。郭、李两人主要史学贡献存在差异,李大钊的贡献主要在倡导唯物史观和构建史学理论体系,郭沫若的贡献则在推进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改革开放后学界对于郭、李两人的学术定位,虽然表述上比较多样,但在内容上基本都承认上述差异。对于郭、李史学贡献之重要性的认识,影响人们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与发展过程的分期。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历程的考察,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过一些尝试。金灿然在《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1941年)中指出,“唯物史观初步运用下的历史学”开始于五四时代。他说:“在《新青年》上,李大钊先生已初步的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的伦理关系。后来,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唯物史观理论的输入,不少人尝试着以之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大革命失败后,更由于革命实践的要求,从社会性质的研究进入到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论战中,“在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社

会史上,唯物史观的方法已占了统治的地位,在这个光辉的方法论面前,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历史方法已显得黯淡无光,失却了活力”。^⑤这种认识已经触及后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阶段性认识。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9年)认为,北伐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中心思想由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转到了社会主义,这时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北伐后新史学的象征。其间,李大钊是中国最初介绍唯物史观的学者,陶希圣的著述是社会史论战第一炮,郭沫若则使中国社会史走上学术道路。^⑥金灿然和齐思和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期的判断各有侧重,前者强调五四时代;后者强调北伐后,尤其郭沫若史学的展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正式兴起,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多样化的史学史撰述中,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历史,做了不同的阶段划分,大体分为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将五四和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视作萌芽(奠基)期,将社会史论战时期视作形成期。在这种史学史叙事下,李大钊通常被视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者、奠基人,而郭沫若则是开创者、开山者,郭沫若的学术地位比较凸显。持此种分期观的学者占学界多数。如尹达以20年代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芽时期,30年代为形成期,称李大钊作为“亲自倡导并努力实践历史学革命的先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奠基者”;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一个辛勤的开拓者”,其《古代社会》“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诞生”。尹达认为,在20年代的中国,受现实革命影响,“全面地运用新观点来重新研究和编著中国历史,实际并不可能”,“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是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的直接产物”。^⑦吴泽也以五四运动时期(1919-1927)为诞生期,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为形成期,称李大钊为“开创者”,郭沫若《古代社会》“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⑧

持类似分期观点的学者还有很多,兹例举如

下。叶桂生、刘茂林的分期:1919-1927年,理论准备阶段(萌芽期),李大钊的新史学是“萌芽期的产物”;1928-1940年,形成阶段,郭沫若是“新史学形成期的开拓者”。^⑤马金科、洪京陵的分期: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他与蔡和森、李达、邓初民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大论战“催生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其标志是《古代社会》的出版。^⑥蒋大椿的分期:奠基阶段,代表人首推李大钊,其次则有李达、蔡和森、瞿秋白;形成阶段,从1928年开始,以《古代社会》出版为标志,郭沫若有首创之功,吕振羽是第二位大师。^⑦吴怀祺的分期: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奠定了基础;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写出《古代社会》,标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⑧王东、胡逢祥等的分期:1927年以前,草创阶段(萌发阶段)也是理论准备阶段,李大钊是贡献最大者,此外还有李达、蔡和森等;社会史论战时期,形成阶段。^⑨王学典、陈峰的分期:萌芽(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李大钊、胡汉民分别从理论建构和具体研究两个方向推进;1930年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和郭沫若《古代社会》出版,唯物史观派史学“正式登台亮相”,并在社会史论战中“崛起”。^⑩乔治忠的分期:1927年以前,李大钊、蔡和森等人的理论探讨,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作了史学理论的准备;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时期,建立和发展,其中有郭沫若、熊得山及《新思潮》撰稿诸人的努力。^⑪周文玖的分期:五四运动后,不断发展壮大,李大钊是其奠基人;社会史大论战时,正式形成和产生,《古代社会》是“开山之作”。^⑫李红岩的分期: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中,李大钊是“直接建立者”,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同样是“创建者”;形成于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古代社会》是形成的“标志性著作”,郭沫若、吕振羽都是“形成期的代表人物”。^⑬张越的分期: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之前,是形成前的准备阶段,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为之打下了理论基础;《读书杂志》发起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初步形成,《古代社会》是“开山之作”,“标志着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开始建立”。^⑭

此外,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划定在1919-1937年间,认为1918年到20年代中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酝酿时期,国民革命时期为1927年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繁荣准备了基础,在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⑮德国学者罗梅君将192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开始,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前提来处理,认为李大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轫,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则是奠基,标志着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始。^⑯这两种观点与前述分期主张相近。

第二,将五四和大革命时期视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期,社会史论战则是发展期。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和郭沫若都被视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拓荒者,但郭沫若史学的典范意义不像第一种分期那样突出。持这种主张的学者人数比第一种分期论者要少。如朱仲玉的分期方法是:产生(1919-1927)、在几次论战中奋勇前进(1927-1937)、在民族命运接受严重考验的关头有了较大的发展(1937-1949),认为李大钊是“第一个拓荒者”,“安放了一块奠基石”,郭沫若《古代社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的第一部史学论著”。^⑰白寿彝、瞿林东将1919-1949年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步建立期,并指出:1919-1927年是第一个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1927-1937为第二阶段,其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观察整个中国历史进程并与革命实践结合。其间,李大钊是“第一个奠基人”,《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相结合的著作,是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郭沫若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科学道路”,《古代社会》是“中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书”,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⑱施丁受白寿彝影响,有着基本相同的分期观点。^⑲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

国》是国内首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专著,其分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诞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捍卫其革命纲领的斗争中初步形成,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时期在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作者认为,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早的开创者”,也是“奠基者”,李达、杨匏安也是“开创者”;郭沫若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其《古代社会》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古史研究的奠基之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⑩彭卫、杨艳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949年以前》是首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专著,其分期是:1919-1927年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奠基期,1928-1937年为成长期,1937-1949年为发展期;就马克思主义史学整体来说,则1919-1927年被视为“酝酿与初步建立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此起步”,李大钊则为“奠基人”。^⑪

除上述两种主流的分期主张外,还有一些个别性的分期主张。如陈其泰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的分期是:20世纪初到30年代初是产生时期;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为迅速发展时期。书中称《史学要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的奠基石”,《古代社会》是“最早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正建立”,社会史论战则被划入了初步发展期。^⑫这种分期像是前两种分期方式的融合。谢保成《增订中国史学史(晚清至民国)》将李大钊史学当作“新史学”,称《史学要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开出草径”,《古代社会》“确立全新体系”,“开出中国史学的新方向”。^⑬作者无意于作明确的阶段划分,而是概括性地提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骨干队伍与基本框架在三四十年代的形成与确立。赵国华的分期也比较独特,即称1919-1930年为奠基(萌芽)时期,1930-1940年为开拓时期,1940-1949年为形成时期,它将郭沫若《古代社会》出版和毛泽东史学思想形成看作分期的节点。^⑭

以上对学界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史分期的基本情况作了梳理,虽然各家分期方法存在差异,但对于李大钊和郭沫若的史学贡献,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持高度肯定态度的。比照本文第一部分来看,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被吸收、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叙事中,很多时候人们甚至把他们当做分期的节点。

辩证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的历程与节点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划分,需要通过设置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节点来实现。郭、李二人之所以经常被当作节点来看待,除了其史学成就较大外,也是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和不同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这影响到人们的分期标准。那么,郭、李二人之史学到底有什么样的时代和路径的差异?人们对他们的学术定位又受到什么样的因素影响呢?

从以往学界的考量来看,或认为郭、李学术贡献各有侧重,或认为二人之史观理解存在差异,其实都揭露了问题的部分根由。但如果全面考察,则还有一些更为复杂、深层的因素需要考虑。

一是理论渊源各异。自李大钊时代起,马克思主义者就陆续开始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并产生过相应的史学作品,但由于人们对唯物史观的初期理解,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自苏联逐渐传入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存在较大差别,使得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中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斯大林式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以进化史观的历史撰述模式为主,界定或划分中国史的时代,较多注意经济分析,而对阶级分析重视不够,中国史分期中忽略了奴隶制存在等。^⑮早在1933年鲁迅就曾预言过李大钊著述的无法风行:“赤者嫌弃颇白,白者怕其已赤,读者盖必寥寥,大约惟留心于文献者,始有意于此。”^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⑰范文澜总结李大钊史学成就时也坦言:“在我们今天看来,其著作当然难免有不成熟的地方。”^⑱所以,前述许冠三和王学典的判断,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回

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演进,李大钊是中国思想界由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转换的时代旗手,是站在进化史观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向的起点上的人物,郭沫若则可视作站在这种转向的终点上的人物。而由于这种转向所带来的史学研究的巨大差异,自然也就深深烙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

二是实作与否。讨论近代史学典范改变时,区分“理念”与“实作”是很重要的,前者注重里程碑式的文献,后者则是在各种场合模仿、套用成书,习得各种新的书写范式的历程。^⑨对于一种史学形态而言,其形成既要有理念,也要有实作。在李大钊这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大的贡献,在于旗帜鲜明地倡导唯物史观研究,并就唯物史观史学理论发表了许多重要、鲜活的见解,甚至还构建了相应的史学理论体系。从这个角度看,他树起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旗,其《史学要论》确乎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念”上里程碑式的文献。但在“实作”层面上,他并没有以唯物史观所提供的理论资源为基础,构建出一个中国史的体系,尤其是未能将社会形态论所内含的历史撰述模式,与中国的具体历史事实相结合,为后世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一种可供效仿的书写范式。李大钊生前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授课时曾惋惜地说道:“现在还没有人用唯物史观的观点编出一部中国历史来。现在历史教不好,就是因为缺少这样一本书。”^⑩这说明李大钊已经意识到唯物史观中国史撰述缺失的问题,可惜壮年牺牲志不逮,留下了历史的遗憾。作为结果,李大钊的史学作品以史论为多,与史料结合还不够紧密,也多偏重近代史的阶段性的研究。这自然都是时代的局限。20世纪20年代的李大钊与30年代的郭沫若,在思想史上的距离是十分遥远的。毕竟,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十年间隔无疑是一个观念和实践的鸿沟。这也是众多学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叙事中,用以区分李大钊和郭沫若史学贡献时的主要理由和依据。

三是影响大小有别。这主要是看对学术传统产生的影响。第一,李大钊在近代史学上的贡献是足以名世的,但其史学作品在塑造史学传统上影响力

有限,郭沫若则不同。尽管李氏是唯物史观史学研究的首倡者,但在大家形成了这种共识,需要进一步前进,开展更具体的操作和需要相应的参考对象时,就难以在他那里寻找到更有效的资源了。这主要在于,他在中国史的分期上调和使用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分期方式。郭沫若的工作则恰恰弥补了这一短板,而且还首倡了战国封建论等许多重要观点,成为后来者争相效仿的对象。正如其本人所言:“草径已经开辟在这儿,我希望更有伟大的工程师,出来建筑铁路。”^⑪论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在李大钊和蔡和森那里就出现了分途。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倡导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做各个专题的历史研究,最后达到共同构建“人类经历论”的历史理论;而蔡和森《社会进化论》则欲申明历史发展总规律,以指导具体的历史认识和现实斗争。^⑫这种论断有助于理解李大钊、郭沫若所代表的学术理路的差异问题,因为郭沫若很明显是沿着蔡和森所走的路径继续向前推进并取得切实成就的学者。第二,李大钊的思想和学术确实影响到很多人,但其中多是共产党内的革命领袖,而其学术衣钵的继承者则相对乏人;但在郭沫若,后来在史学界声名显赫的吕振羽、侯外庐、尹达等,都自称是其学生或追随者,他们是沿着郭沫若所开辟的道路前行的人。

四是组织支持与否。李大钊虽然是中共党内唯物史观史学研究的先行者,但一直是作为革命领袖受到推崇的,其史学贡献较晚才引起党内学者的重视。在郭沫若,其知识分子领袖地位很早就得到确立并获得中共党组织有意识的支持。郭沫若曾在大革命时期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在国共两党内部都有一定威望。1927年3月,当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后国内政局云谲波诡之际,周恩来提出建议——推举郭沫若为知识分子领袖,以推进民众运动的发展。^⑬此后较长时期,中共都比较注意树立郭沫若的形象。1941年10月,周恩来在纪念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和五十寿辰中直接将郭沫若和鲁迅作比,称其为“革命文化的班头”,认为郭氏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

战斗生活”值得大家学习。^⑧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作为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学术影响力进一步增强。1978年,在郭沫若逝世之际,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郭沫若作出评价,称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⑨这种源自党组织的支持,对于塑造郭沫若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有着重要作用。

跳出李大钊与郭沫若的对比,重新检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兴起的历程,会发现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史学作品。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1924年)、《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年),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1924年),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7年),萧楚女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27年),吴玉章、林伯渠的《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1928年),^⑩熊得山的《中国社会史研究》(1929年),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1929年)等,它们或许由于各种原因而达不到学术路标的意义,但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相关领域的开创性作品。

在以往的史学史叙事中,一些学者其实已经关注到这些问题。他们在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时,也往往会提到李大钊、郭沫若同时代学者的贡献,诸如李达、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熊得山、吕振羽等就常被讨论,甚至胡汉民、陶希圣也会被提到,参见前述分期主张即可知。但也有学者因为过度强调了郭、李二人的标志性意义,而对蔡和森等其他人物的开创性贡献有所轻视,从而使得学术史过于简单化。乔治忠曾言:“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个创树,但也不应独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的标志。”^⑪这种反思适用于对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史的认识。所以应当辩证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的历程与节点之间的关系,在讨论个别重要人物和著述之标志性意义的同时,也注意给予其他人物和著述以相应的学术史地位。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史的分期,目前

学界的主张见仁见智。论者有将唯物史观的倡导及其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标准的,即重视“理论”,这意味着其产生时期比较早,以理论性著述的出现为标志。有将唯物史观理论与中国历史的深度结合作为产生标准的,即重视“实作”,如乔治忠言,“一种新型史学的建立,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形成新的史学理论,二是具有依照新理论撰成的历史著作”。^⑫王东、王兴斌言:“像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着理论研究与实际研究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着理论建树和实际研究的双重任务。”^⑬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必然会划分为理论奠基和实际撰著前后两个阶段,并以后者,即中国史研究的某些拓荒性著作的出版为主要标志,深入一点,则是以史著中的某些书写范式、史学体系的生成作为标准,如此则容易将社会史论战或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革命史体系、通史体系的生成作为主要标志。有将史学形态的形成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标准的,史学形态牵涉历史观、史学著作、基本问题、史学范式、史学队伍、史学方法、史学特色等众多要素,那社会史论战或是整个20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可能被当作诞生标志。

就诸种分期方法和标准比较而言,以史学形态为产生标准可能最为合适。我们讲一种新的历史学类型的诞生,更多的应该是就史学形态而言,对诸种史学要素的产生进行整体性考察,而不宜以单一史学要素的产生为标准。首先,如果单以“理论”的提出为标准,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质难以凸显出来,比之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何以称“中国”?必然具备中国历史和史学之彩色,才可称“中国”,故与中国历史相结合是为必要条件之一。其次,如果仅以“实作”为标准,则前述列举的从蔡和森到熊得山的一系列著述(其中多是著作),都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的产物,且覆盖了从古代史、近代史、中共党史等领域,无视这些成果,而硬将郭、吕或社会史论战的成果视作产生标志,是说过去的。但如此,则与后来人们所熟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较大差异,因为20世

纪2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认知尚未定型,专业史家队伍没有出现,史学共同体和史学范式都未能形成,基本问题和研究方法也不稳定。再次,史学范式是史学形态最核心的内容之一,以史学范式为标准或以史学形态为标准,具有一定相似性,但又存在差异,因为同一史学形态可能包含多种范式或演变为不同范式。最明显的是,“革命史范式”在改革开放后遭遇了“现代化范式”的挑战,但我们不会否认,以“现代化范式”书写近代史,仍然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时,在中国古代史、世界史、考古学等不同的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独特的解释体系或范式。故以所谓范式的生成为标准,到底有些理由不够充分。最后,以史学形态作为产生标准,能够更为有效地描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时的状态,在容纳前述标准的同时,回避相应弊端。不过其中也有一个问题,史学要素过多,生成时期不一,以何者为标准?这需要综合把握。

以史学形态为标准,判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则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为较合适的标志。这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多数要素已经逐渐具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已较为稳定,经典史学著作不断出现,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史学共同体、基本史学方法、基本问题、史学特色也初步形成,史学范式、史学体系虽然还缺乏总结性工作(这是在抗战时期完成的,以毛泽东史学思想和中国通史体系的形成为代表),但基本内容已经出现。笔者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此前经历了五四前后的萌芽阶段、国民革命时期的起步阶段,到社会史论战时期,才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形态,才是具有完整意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⑨作为节点,李大钊和郭沫若分别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芽期和形成期的标志性人物。他们与蔡和森、熊得山、吕振羽等人一样,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①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89、

298页。

②王学典:《从“五四”到“抗战”:唯物史观派历史观念的重要变动》,《齐鲁学刊》2000年第3期。

③季融五:《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三)》,《建设》1920年第2卷第5号。

④卢绍稷:《史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21-122页。

⑤刘静白:《何炳松历史学批判》,辛垦书店1933年版,第16-17、146-147页。

⑥叶建:《李大钊〈史学要论〉与内田银藏〈历史理论〉的比较》,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341页。

⑦朱谦之:《历史科学论》,《现代史学》1935年第2卷第3期。

⑧刘剑横:《历史学ABC》,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33-35页;周容:《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5页;李则纲:《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61-162、165页;杨鸿烈:《史学通论》,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38、285页。

⑨中夏(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1卷1923年第6期。

⑩鲁迅:《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1933年5月29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2页。

⑪郭湛波:《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大北书局1935年版,第135页。

⑫文甫(嵇文甫):《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李霖编:《郭沫若评传》,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219页。

⑬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104页。

⑭郭湛波:《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第196页。

⑮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46年版,第17页。

⑯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1941年第4辑。

⑰靖公:《新史学批判》,《杂志》1944年第13卷第4期。

⑱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7-98页。

⑲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卷。

⑳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14页。

㉑张好礼:《中国新史学的学派与方法》,《读书青年》1945年第2卷第3期。

㉒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

1949年第2卷。

②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解放日报》

1941年11月20-22日连载。

④杨荣国:《李守常先生的思想》,《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2卷第1期。

⑤范文澜、王南:《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李大钊同志》,《人民日报》1949年4月28日。

⑥吴玉章:《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倡导者——李大钊同志》,《新华周报(无锡)》1949年第2卷第1期。

⑦刘绍孟:《李大钊同志和历史科学》,《史学月刊》1959年第7期;杨丙元:《李大钊同志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史学月刊》1965年第4期。

⑧皮明麻:《李大钊史学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79年第4期。

⑨黄烈:《郭沫若在史学上的贡献》,《人民日报》1983年8月29日;又见《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专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

⑩皮明麻:《李大钊史学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79年第4期。

⑪叶桂生:《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

⑫李润苍:《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史学的巨大贡献》,《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⑬佟佳凡:《李大钊同志的史学思想初探》,《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⑭尹达:《郭沫若所走的道路及其杰出的学术贡献》,《史学月刊》1983年第2期。

⑮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编:《郭沫若集外序跋集·后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页。

⑯李世平:《郭沫若在史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南充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⑰黄烈:《郭沫若在史学上的贡献》,《人民日报》1983年8月29日。

⑱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史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页;蒋大椿:《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44页。

⑲朱政惠:《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页。

⑩蒋大椿:《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第143-144页。

⑪李华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命运》,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179页。

⑫侯且岸:《李大钊历史思想述论》,《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⑬张艳国:《李大钊阐释唯物史观评析》,《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

⑭吴汉全:《李大钊与历史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⑮欧阳哲生:《李大钊史学理论著述管窥》,《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

⑯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

⑰林甘泉:《郭沫若早期的史学思想及其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

⑱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⑲陈其泰:《郭沫若史学的时代精神》,《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⑳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第3版,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㉑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0-22日连载。

㉒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卷。

㉓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87、491、517、522、523页。

㉔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修订本)(上),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7页。

㉕叶桂生、刘茂林:《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学的创立和发展》,《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11期;叶桂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芽》,《晋阳学刊》1988年第4期;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㉖马金科、洪京陵编:《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325页。

㉗蒋大椿:《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罗志田主编:

《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第136、143-144页。

⑤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99页。

⑥王东、王兴斌:《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5期;胡逢祥等著:《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中册,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758、760、873页。

⑦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3-87页。

⑧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4-389页。

⑨周文玖:《因革之变——关于历史本体、史学、史家的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236、248、251页。

⑩李红岩:《中国近代史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8、10、16页。

⑪张越:《中国史学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4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5期。

⑫[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7页。

⑬[德]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孙立新译,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64页。

⑭朱仲玉:《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⑮白寿彝、瞿林东:《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433页。

⑯施丁:《中国史学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226、267-268页。

⑰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第1、11、12、93、200、208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⑱彭卫、杨艳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2页。

⑲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2页。

⑳谢保成:《增订中国史学史(晚清至民国)》,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28、502页。

㉑赵国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生与发展》,《江汉论坛》1992年第7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析》,《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㉒谢辉元:《进化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诞生》,《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

㉓鲁迅:《致曹聚仁》,《鲁迅家书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71页。

㉔鲁迅:《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1933年5月29日),《鲁迅全集》第4卷,第402页。

㉕范文澜、王南:《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李大钊同志》,《人民日报》1949年4月28日。

㉖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㉗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㉘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41页。

㉙乔治忠:《中国史学史》,第378页。

㉚力平、方铭主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㉛力平、方铭主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532页。

㉜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人民日报》1978年6月19日。

㉝张剑平认为该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发展中有开山作用,同样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诞生。参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73页。

㉞乔治忠:《中国史学史》,第388页。

㉟乔治忠:《中国史学史》,第379页。

㊱王东、王兴斌:《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5期。

㊲谢辉元:《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19-1949)》,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190页。